

从开放走向市场

——沿海开放地区经济体制转轨的一个案例研究

李文溥 焦建华

(厦门大学宏观经济研究中心 厦门大学经济学院 361005)

内容提要:本文以福建为例,研究沿海地区对外开放与市场取向改革的相互关系及其对市场化的作用。论文首先回顾福建 1978—2008 年的改革历程,然后总结改革开放使福建发生的跨越式变化,继而探讨福建市场化进程及其成因,基于以上案例分析,最后从理论上总结开放对于原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轨也即改革的重要作用,认为对外开放是推进中国经济市场化改革的根本手段之一。改革必须与开放携手,从开放走向市场,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实践值得重视的基本经验之一。

关键词:改革与开放 案例研究 经验总结

1978—2008 年,即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30 年,是中国 1949 年以来最为辉煌的 30 年。这一时期社会经济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与进步,与十一届三中全会所确立的改革开放路线密切相关。研究发现: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各地区的市场化水平基本相同。30 年后,东部地区的市场化水平普遍高于西部地区,沿海开放地区普遍高于内地,市场化指数与省市区人均 GDP 之间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本文以福建为例,研究沿海地区对外开放与市场取向改革的相互关系及其对市场化的作用。

—

福建位于中国经济最发达的东南沿海地区,但改革开放前一直是全国经济最落后的省份之一。1952—1978 年年均增长率仅 5.42%,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978 年,地区生产总值在全国 29 个省区中名列第 22 位,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居全国第 23 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27%。

(一) 改革开放迟缓前行

1979 年 7 月,中央正式确定广东、福建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在计划、物资供应、物价政策等方面实行新的经济体制和灵活政策。1980 年 10 月,国务院决定在厦门湖里划出 2.5 平方公里,设立特区,实行市场调节为主的管理体制。在全国仍实行计划经济之时,福建、广东因其区位、与港澳侨台的历史联系,某种程度上也因其在全国经济的地位相对不重要,在看似不经意的偶然中,成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试验田和对外开放的飞地,获得了改革与开放的试验权、率先发展的历史机遇。

但是,此后三四年里,福建并没有抓住机遇。最早的经济体制改革试验——农村承包责任制没有发生在福建,当安徽、四川主动打破传统体制桎梏,试行联产承包制取得重大成效,获得中央明确肯定后,福建仍然拒绝跟进。1979 年 2 月,当时的省委主要领导在省委工作会议上公开表态“不赞成

见樊纲、王小鲁等对各省市场化指数的研究,2001 年—2005 年,中国市场化指数前十名的省市,基本上位于东部沿海开放地区,尤其是东南沿海地区,市场化指数后十名的省市自治区,全部位于西部内陆地区,尤其是西北。樊纲等主编:《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报告(2000、2001、2004、2006)》,经济科学出版社。

福建省完全有可能成为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先驱之一。1978 年闽清县省璜公社洼垵大队、漳平县新桥公社、建阳地区等地农民已开始“分田单干”。《洼垵大队刹住分田单干歪风》、《新桥公社纠正闹分队的“自由风”》,《福建日报》1979 年 4 月 13 日;《清理“左”的思想,落实生产责任制》,《福建日报》1981 年 4 月 23 日。

包产到组”,更反对包产到户,认为是“单干”,走资本主义。1979年3月,建阳(现南平市)地委对实行包产到组的社队粗暴干预,强行“纠偏”。1980年初,建阳地区10县除个别外,已实行联产计酬责任制的社队大部分被强扭硬纠回去。

1980年9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文件,第一次明确提出实行“包产到户”,打破了多年来把包产到户等同资本主义的僵化观念。“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在全国大部分地区迅猛发展,成为农村改革的主流。

然而,福建省委却继续下达文件要求坚持人民公社制度,强调福建情况特殊,不宜提倡联产承包,不能包工到组,更不能包产到组和包产到户。省委还召开地(市)委书记碰头会,强调要纠正以组核算和包产到户等“偏向”。到1980年底,全省建立大田生产责任制的12.8万个农村核算单位中,包产到组的占3.4%,包产到劳或到户占7.6%,双田制占6%,包干到户的仅占0.2%。

与广东相比,福建改革的阻力非常大,动力严重不足,工作止步不前。1980年12月上旬,中央调整福建省委领导班子,项南到福建主持工作。

(二)改革与开放并行

项南到任后立即全面推广联产承包责任制。1981年8月底,全省94.5%的生产队建立了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1983年,实行“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的生产队占全省生产队总数的99%。与此同时,项南提出“大念山海经、建设八大基地”的战略构想,大胆探索工业企业、商业流通、物价、金融和综合配套等方面改革。福建城市经济改革蓬勃兴起,走在全国前列。

1984年3月24日,《福建日报》头版头条全文刊登《五十五名厂长、经理呼吁——请给我们“松绑”》的来信,呼吁“给企业松绑放权”,引起强烈反响和共鸣。当日,福建省委组织部决定在企业人事任免、干部制度改革、厂长权力等三方面给企业“松绑放权”。随后,《福建日报》连续报道“松绑”问题。一周后,《人民日报》全文转载“松绑信”,并配发“编者按”,指出“这封呼吁书提出了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问题”,旧体制“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了”。随后,《人民日报》和新华社连续追踪报道,国家体改委和国家经委邀请这55位厂长经理的代表赴京座谈体制改革。一时间,“松绑”、“放权”成为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话题,来自福建企业界的呼吁成为全国深化国有企业乃至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先声。

在全力推进改革的同时,项南力主充分利用中央“特殊政策”,实现福建对外开放先行。早在1981年,他就主张厦门特区借鉴香港经验,建设大陆第一个自由港。他还提出,对侨商、外商要进一步放宽政策,实行更加特殊、更加灵活和更加优惠的政策。对双方有利的要干,我们利小的要干,即使暂时没利但从长远来说对我们有利的也要干。1984年2月,邓小平视察厦门,项南全力争取中央支持厦门的改革,请求把厦门特区扩大到全岛,并实施“某些自由港的政策”。1984年3月,国务院决定把厦门经济特区的范围扩大到整个厦门岛(含鼓浪屿),并逐渐实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1984年,福州成为全国14个沿海开放港口之一,并设立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福州经济技术开发区(1985年1月)。1985年2月,厦门市的同安县、泉州、漳州的部分县市共11个县(市)辟为闽南三角经济开放区,成为沿海经济开放带的重要组成部分。1986年,福建省委四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明确发展外向

《省委领导同志在省委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79年2月4日。转引自曹敏华、欧阳小松《福建改革开放的历程》,厦门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5页。

福建省地方志编委会编:《福建省志·总概述》,方志出版社2002年版。

福建省地方志编委会编:《福建省志·总概述》,方志出版社2002年版。

福建省统计局编:《福建省情选编》(1983年),福建省统计局1984年版,第45页。

见1984年3月24日《福建日报》及《福建日报》、《人民日报》等报刊的后续报道。项南亲自为“呼吁信”写了《福建日报》“编者按”。3月24日后来成为中国“企业家活动日”。

在争取厦门特区扩大的同时,项南还提出了开放沿海城市的建议。不久,中央决定,深圳、珠海、汕头的特区都扩大到全市范围,并明确了特区的四个窗口地位。从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项南推动了我国经济特区的扩大和重新定位,推动了沿海地区多层次开放格局的形成。

型经济的指导思想、主攻方向、政策措施和分阶段的目标等。经数年努力,福建的对外开放终于也走在全国前列,与广东并驾齐驱。

项南主政期间,尽管存在诸多困难及阻力,但是改革开放的先发优势开始体现。1979—1986年福建省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0.30%,居全国前列。1986年社会总产值为397.94亿元,居全国第18位,人均国民收入672元,居全国第16位,较1978年分别提高4位、7位。更重要的是,确定了外向型经济发展道路。1979—1986年累计批准外商投资合同808项,合同金额7.04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2.49亿美元。1979—1986年外贸进出口年均增长37.25%,其中出口年均增长26.89%。1985年工业制成品的出口额首次超过初级产品。外贸依存度和出口依存度都有很大提高,1979年为5.70%和5.12%,到1986年上升到22.53%和11.48%。此外,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产业结构和地区经济格局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下也开始进行重大调整。1986年,项南被免职后,尽管中央赋予的先行改革权限没有改变,但是福建的体制改革基本上是随大流跟着走,有时甚至落后、逆行。例如,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后,全国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的步伐前所未有地加快,福建却忙于“社教”运动,再次与历史机遇擦肩而过,直至1993年才奋起直追。

(三) 开放先行:多层次、全方位、宽领域的开放格局形成

尽管福建的经济体制改革自1986年以后基本上随大流,但对外开放为福建经济的市场化另辟蹊径。1987年11月,中央提出加快实行国际经济大循环的战略思路,1988年3月,希望尽快推进福建经济发展的省政府把目光盯住了外部资源的引进,向国务院请示,要求福建“以国际市场为导向,以国内市场为依托,大进大出,走国际经济大循环的路子”,“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20世纪90年代又提出“外贸立省”的发展思路等。

1988年1月和3月,国务院两次批准扩大福建沿海经济开放区范围。1988年4月,国务院批准了《关于福建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快外向型经济发展的请示》,在福建建立综合改革试验区,赋予“十一条”特殊政策,鼓励福建“在改革开放中继续先行一步”,并批准厦门市实行计划单列,赋予省一级的经济管理权限。同年,福建省政府在沿海经济开发区范围内设立湄洲旅游经济区和东山创汇农业试验区,批准石狮、福清进行改革开放综合试验,扩大对外开放。此外,国家还批准设立了福州和厦门两个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1989年,国家又批准在福州和厦门设立台商投资区,分别实行经济技术开发区和经济特区的政策。福建省据此提出“大中小项目一起上、港侨台外都欢迎”和“以侨引台,以港引台,以台引台,以港澳台引外”的方针,进一步促进外向型经济的发展。

1992年,国务院又先后批准将厦门集美、杏林列入台商投资区,实行经济特区政策,批准福州经济开发区扩大到10平方公里,将武夷山和湄洲两地辟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批准在厦门象屿和福州马尾设立保税区,批准融侨经济技术开发区和东山经济技术开发区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将宁德地区开发扶贫综合改革试验区列入国家扶贫综合改革试验区,批准南平、龙岩和三明等为对外经济开发区。

1993年1月,国务院批准将三明、南平和龙岩3市和宁德的福安市和福鼎县列入沿海经济开放区。同月,国务院批准成立东山经济技术开发区。

至此,中国最早对外开放的省份之一——福建省开放区域面积约5.4万平方公里,占全省总面积的41.9%,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保税区、台商投资区、旅游度假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开放区等构成了厦门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和闽南厦漳泉金三角开放地区—福州至闽南5地市连片开放

此案始末,可参阅孙长江《中国改革先锋项南因“晋江假药案”蒙冤下台》,http://news.china.com/zh-cn/history/all/11025807/20050517/12321379.htm

方舟:《福建的现代化:前世、今生与未来》,《福建论坛》(经济社会版)2003年第8期。

李树桥:《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决策机制》,《炎黄春秋》2008年第4期。

城市和闽东南开放地区—全省全方位开放的梯度推进的多层次、全方位、宽领域的开放格局,福建成为全国对外开放程度最高的区域。

二

由于改革开放,福建经济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

变化之一:外资经济迅速发展。资本短缺是福建经济发展的最大制约。对外开放,引进外资,使福建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资本瓶颈,实现了高速增长。1979年9月,福建批准成立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福建华侨企业公司。到2006年,福建累计批准外资项目39942项,合同金额1099.9亿美元(历史可比口径),年均增长39.09%,实际使用外资472.8亿美元,年均增长38.04%。FDI不仅增速快,而且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的比重逐渐上升。2006年,包括港澳台商在内的FDI企业固定资产投资额占福建省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20.4%。外资企业工业产值占全省工业产值比重达52.72%,同期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产值下降到18.43%。1996—2006年,外资企业出口年均增长率为16.70%,高于全省出口年均增长率。2006年,福建外资企业出口占全省出口总额的59.62%。

变化之二:外贸飞速发展。1979—2006年,福建出口年均增长率高达28.7%,高于全国年均增长率5个多百分点。福建外贸在20世纪90年代进入快速增长期,在全国的地位也迅速上升。1990年福建出口贸易总额22.4亿美元,是1978年的12倍,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978年的4.9%上升到14%。1995年,福建进出口总额146.68亿美元,仅次于广东和上海,居全国第3位。出口总额93.26亿美元,占全国比重由1978年的0.9%上升到6.3%,位次由第11上升至第5。1999年出口103.76亿美元,成为出口超过百亿美元的省份。2006年进出口贸易总额达到626.6亿美元。外贸依存度的变化充分反映了福建的开放程度。1978年,福建外贸依存度仅为5.16%,低于全国同期水平(9.89%)近半。1991年,福建外贸依存度超过50%,1994年外贸依存度达到63.23%。外贸依存度和出口依存度的不断提高反映了福建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和加深,90年代中期就已接近或达到亚洲新兴或次新兴工业国家水平。进入21世纪后,福建虽然与主要新兴工业国家的贸易依存差距开始扩大,但与全国贸易依存度水平仍基本相当。

变化之三:在国际竞争中调整产业结构,产业国际竞争力迅速上升。对外开放所推动的工业化深刻改变了福建的产业结构。改革开放前,福建的经济结构呈现浓厚的不发达经济色彩。直至1985年,福建出口商品仍有44.7%是初级产品,工业制成品中,杂项制品比重高达66.4%(这还是7年对外开放的最重要成果之一),化学品及有关产品和机械及运输设备的比重不到20%(表1)。化学品及有

项目	1985年	1990年	1995年	2000年	2005年	2006年
出口总值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一、初级产品	44.7	21.8	20.3	10.6	6.2	6.4
食品	32.8	15.7	13.9	9.8	5.5	5.7
饮料及烟草	...	0.6	1.2	0.04	0.04	0.03
非食用原料	11.2	5	4.9	0.6	0.5	0.5
矿物燃料	0.3	0.2	0.2	0.2	0.2	0.1
动、植物油、脂及腊
二、工业制成品	55.3	78.2	79.7	89.4	93.8	93.6
化学品及有关产品	4.4	2.3	1.2	2.7	2.6	3.1
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	8.5	5	4.5	15.1	14.6	16.8
机械及运输设备	5.7	20.1	16.5	26.0	37.2	35.8
杂项制品	36.7	50.8	57.5	45.6	39.4	37.9
未分类商品

资料来源:《福建统计年鉴》(2007年),中国统计出版社2007年版。1985、1990、1995年的杂项制品比重是作者推算的。

关产品和机械及运输设备占出口商品比重低,说明在长期封闭的计划经济下形成的重化工业在国际竞争中没有任何优势。

到 1995 年,福建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跃上一个新台阶:出口商品中,工业制成品约占 80%,以杂项制品为代表的低素质劳动密集型产品取代原来的资源型初级产品,成为福建最主要的出口产品。2006 年,福建出口产品结构实现第二次升级:工业制成品占 90%以上,其中,机电及运输设备、化学品及有关产品的出口比重约占 40%,第一次成为首位出口产品。与出口商品结构相联系的是福建省不同产业出口产品国际竞争力逐次替代(图 1):先是杂项制品的国际竞争力超过了资源型初级产品,接着杂项制品国际竞争力下降,与此同时机械及运输设备等具有更多资本与技术含量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迅速上升,出口比重逐步取代前者。化学成品及有关产品的贸易竞争指数在 2003 年也终止长期下滑趋势,开始较快回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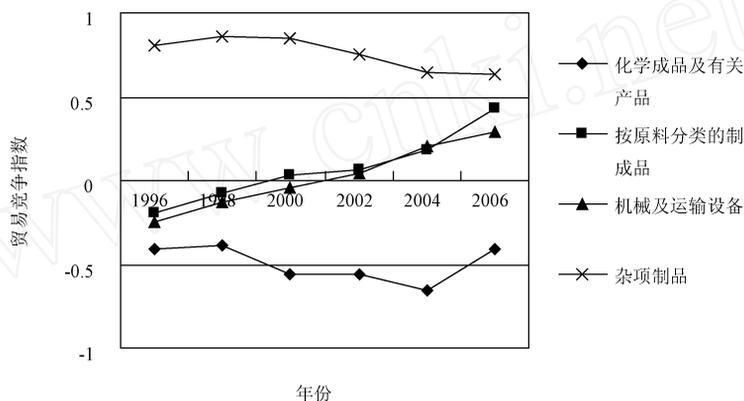


图 1 1996—2006 年福建工业制成品贸易竞争指数变化趋势

资料来源:福建统计局编:《福建经济与社会统计年鉴(对外经济篇)》(2007 年),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

变化之四:区域发展新格局的形成。对外开放改变了福建的经济发展格局。改革开放前,福建的地区发展格局呈现典型的封闭型计划经济特征。1978 年,福建 9 地市中,沿海地区除厦门外,其余地区(福州、泉州、漳州、莆田、宁德)人均地区生产总值都低于位于内陆山区的三明、南平(表 2)。主要原因是:计划经济条件下,三明、南平等地人口密度低,人均耕地面积大,农业人均产值较高,而且作为福建省战略后方的小三线建设区,获得了最多的工业投资。

对外开放后,福建参与国际经济竞争,以利用比较优势为导向的工业化迅速推进,沿海地区与内陆山区的经济实力逐渐逆转。到 2006 年,不仅厦门、福州、泉州与福建其余 6 市拉开距离,形成两个俱乐部,而且大部分沿海地区或发展水平超过、或发展速度快于原先的内陆先进地区。地区经济格局的巨大变化,极为生动地反映了对外开放对福建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影响。

变化之五:长期高速增长。上述四大变化促成了福建经济 30 年持续高速增长,1979—2006 年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 11.64%,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2.62 个百分点。以大致 5 年为期,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除 2001—2006 年外,其他时期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最高达 5.39 个百分点。

高速发展使福建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在全国的地位日趋重要。2006 年地区生产总值 7 614.55 亿元,占全国 3.51%,较 1979 年的 1.80%提高了近 2 个百分点。同期福建经济在全国的排名也不断上升。1997 年福建的地区生产总值在全国的排名从 1978 年第 22 位提高到全国第 11 位。1998 年,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排名从 1978 年全国第 23 位提高到全国第 6 位。2007 年,福建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25 424

厦门是特例,它只有同安一个辖县,若按照其他地市相同的辖区范围,1978 年的人均 GDP 也将低于三明、南平。例证之一是省会福州。表中的数据是按照现有辖区计算的,由于福州的辖县(多为沿海地区)人均 GDP 水平较低,1978 年福州市的人均 GDP 居然低于三明、南平地区。

有关研究,请参见李文溥、吴娟《沿海开放省区内的“俱乐部收敛”——以福建为例》,厦门大学宏观经济研究中心工作论文。

元,在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中排第8位。

表2 1978—2006年福建各地区实际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与区际比值

	1978年		1990年		2000年		2006年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元)	区际比值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元)	区际比值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元)	区际比值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元)	区际比值
宁德	219	1.00	527	1.00	1 847	1.00	3 206	1.00
龙岩	245	1.12	679	1.29	2 191	1.19	3 761	1.17
南平	353	1.61	907	1.72	2 280	1.23	3 995	1.25
三明	405	1.85	1 247	2.36	2 862	1.55	4 859	1.52
莆田	197	0.90	554	1.05	2 097	1.14	4 207	1.31
漳州	261	1.19	593	1.12	2 841	1.54	5 120	1.60
泉州	171	0.78	574	1.09	6 223	3.37	10 632	3.32
厦门	528	2.41	2 502	4.74	13 514	7.32	26 169	8.16
福州	293	1.34	1 072	2.03	6 489	3.51	11 822	3.69

资料来源:《辉煌的55年——福建区域经济发展概览》、《福建经济与社会统计年鉴(国民经济核算篇)2007》等。

三

如何评价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福建的市场化进程,以及改革开放在推进福建经济市场化中的作用,直接关系到对开放与改革关系的理论探讨。笔者引用樊纲、王小鲁对全国各地市场化进程多年持续研究的成果,对福建市场化进程及其成因进行分析。

根据樊刚、王小鲁等计算的1997—2005年中国市场化指数,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福建已成为全国市场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1997—2000年福建的市场化指数一直位列前3名,到2001—2005年,尽管有个别省份转型更快,赶上或超过,但是福建仍居全国前4或前5。由于缺乏数据,我们无从得知1978年福建在全国市场化指数的排位,但是,可以推知,尽管当时全国都实行大致相同的计划经济体制,福建地处海防前线,经济军事化的要求更高,市场化水平只会更落后。然而,在近30年里,福建不仅在经济增长速度上,而且在体制转型上,都实现了跨越(国内多数其他地区)发展。当今的福建已一改1978年时在全国的落后境地,是全国出口大省之一,整体实力居全国中上游,市场化水平名列前茅,同时原有经济格局完全颠覆,沿海地带崛起。这种历史性的变化显然来自于改革开放。但是,就福建而言,改革与开放的各自作用究竟如何呢?

如前所述,1981—1986年之外,福建经济体制改革并无杰出表现,基本上体现为滞后或“随大流”。但是,对外开放在中央的大力支持下蓬勃发展。因此,福建领先于全国的市场化水平,更多来自于对外开放的推动。福建市场化指数的分项指数也证实了这一点。福建市场化指数始终居前列的是劳动力流动、产品市场发育程度、价格由市场决定程度、非国有经济发展、减少商品市场上的地方保护等。此外,引进外资和要素市场发育程度的得分也较高。这些指数大多与福建高度的对外开放密切相关。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福建政府与市场关系、市场中介组织的分数和排名一直较落后,这从侧面说明了内部自主改革的动力不足,政府改革滞后于市场化进程。因此,福建市场化程度的领先并非主动改革的直接结果,更多的是对外开放推动的产物。

如果从更大范围观察,可以发现,福建的情况其实具有一般性。我国目前市场发育程度领先的地

该指数主要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产品市场的发育程度、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市场中介组织和法律制度环境等5个方面评价各省市区的市场化相对程度,并有分数和相应排名,指数体系2001年后基本趋于一致。文章引用的得分和排名,详见樊纲等主编《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报告(2000、2001、2004、2006年)》。

区:上海、浙江、广东、江苏、福建、北京、天津、山东、辽宁、重庆,基本上是沿海开放地区,其经济发展得益于对外开放,参与国际分工与国际竞争甚多,体制也因此迅速转轨,尤其是上海。与广东、福建等不同,1992年之前,上海始终实行严格的计划经济管理。这个全国经济中心、最大城市的经济增长速度居然一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992年起,上海与全国其他地区一起向市场经济转轨,并在对外开放上实行特殊政策。短短16年,上海市场发育程度跃居全国第一。相反,西藏、青海、甘肃、贵州、陕西、宁夏、新疆等地地处西北内陆,外部市场力量较难进入,尽管与上海同时向市场经济转轨,但是至今市场发育程度却仍然是全国最低的。显然,对外开放,参与国际经济分工与竞争对其体制转轨所起的作用不容忽视。

四

1978年,我国东西部地区从大体相同的体制起点出发,开始经济市场化进程。30年后,不同的结果出现了:东部地区的市场化水平普遍高于西部地区,沿海开放地区普遍高于内地。如前所述,在这30年的大多数时段里,福建并未推行明显超前的体制改革措施,但其市场化进程却领先国内大多数省份,甚至超过经济发展水平在全国的排名。我们认为,福建出现市场化进程超越其改革力度现象的根源就在于对外开放。

这一现象也就引出了在经济市场化进程中开放与改革之间关系的理论思考。长期以来,这个问题似乎被忽略了,学界大多习惯于将改革与开放并称,市场化方面甚至更偏重改革的主导作用。然而,福建及东南沿海开放地区的市场化实践却表明:开放比改革对经济市场化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是推进经济市场化进程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改革开放之初,对外开放并未被视为市场取向改革不可或缺的根本手段之一,而只是基于国内资金不足、技术和外汇短缺采取的策略性措施,对外开放的初衷是利用国内廉价劳动力发展出口加工贸易,部分解决就业问题,赚取外汇。出乎意料的是,当内部的经济体制改革因种种原因而难以超前发展时,对外开放却悄然在福建(以及其他沿海开放地区)引起了一场对体制转轨具有根本意义的革命。开放能部分承担这一任务的原因在于:改革的目标是实现市场化,而外部世界是市场经济占统治地位,开放与改革同向互补。开放所引进的外部市场冲击,比体制内的自主改革具有更强大、更持久的力量,不存在内部自主改革进程中必然产生的改革疲劳症和懈怠,更能打破体制内既得利益集团的改革阻力,更能克服社会既有思想意识、文化习俗所形成的价值否定与行为惰性,更能坚韧和持久地推进体制转轨。因此,对外开放对经济市场化的重大意义值得认真探讨。

当然,对外开放能够成就体制改革需要一些前提条件。

前提之一:所推进的经济体制改革是市场取向的,同时,对外开放是面向外部市场经济的开放。这样,改革与开放也就找到一个契合点:市场化。

前提之二:实行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主体比较贫困,亟需外部资源的流入以发展本地经济,解决贫困问题。因其贫困,有变革的渴求;因其贫困,对外来资本的需求比较迫切;因其贫困,对开放产生的物质利益的考虑更易于超越既存社会价值判断——很可能本身就是错误的——对实行对外开放的意识形态阻碍。

前提之三:以财政大包干为特征的地方分权体制,它形成了地方政府推动本地区经济发展的强烈激励机制。

在这些前提条件下,对外开放为什么能比内部的体制改革更强有力地推动经济的市场化转轨呢?

第一,对外开放引入的市场力量一般比体制内的改革力量更为强大。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很低而且多年没有改变,但因长期封闭和思想禁锢,很

1978年的福建,其经济发展水平,在全国经济中的地位未必都高于这些地区。

多人形成适应性麻木。只要生存能维系,对体制弊病,普通民众一般并不主动提出改革诉求,多是消极抵制。这种抵制,时间长了会产生一种总计后果:经济活力逐渐丧失,增长率递减。这种情况为体制内领导层中的有识之士,具有高度忧患意识的先知先觉所察觉,所担忧,因而不计个人得失地奔走呼唤,推动改革。这必然遭遇体制内既得利益集团抵制改革的重重阻力,需要克服一个社会既有思想意识、文化习俗所形成的价值否定与行为惰性。与所要挑战的旧体制以及与其相适应的社会文化价值相比,改革者往往显得相对弱小,在意识形态方面处于相对不利地位。当群众尚未亲身体验改革给他们带来的利益,摆脱多年旧体制的封闭和思想禁锢而产生的适应性麻木之时,改革者往往显得孤独无援。在这种情况下,内部的自主改革常常因改革者被体制内的暗箭射中落马,改革半途而废,或者由于需要长期难见成效的坚持,改革者产生了改革疲劳症和改革懈怠,久而久之,改革名存实亡,逐渐消弭于无形。

然而,对外开放引进的市场力量从一开始就显示出强大的力量:

1. 相对于东道国资本,FDI本身比较强大。邓宁等曾指出,进行跨国投资的资本一般要比东道国资本更有优势,否则无法离开母国进行跨国投资。对于FDI而言,使东道国成为与外部世界同样的市场经济,按照国际惯例运行,最有利于它的运营。因此,外来的市场力量既有欲望,也有能力促进东道国的市场化。

2. 由于当地资本短缺,当地政府必然要对外资提供各种政策优惠。外来的市场力量不仅因此获得较优的生存和发展条件,而且促进东道国经济市场化的需求比较容易得到东道国政府的支持,尽管这些需求有时未必与东道国政府的价值取向一致。

3. 外来市场力量前来投资,是受切切实实的物质利益驱动。由此而产生的行为动机较之体制内具有忧患意识的先知先觉者自主改革的动机,激励更强大,因此会更坚韧,更持久地促使东道国的体制向适应其利益方向的转轨,不断的物质利益驱动使它不可能产生内部自主改革必然出现的疲劳症和懈怠。当然,我们并不因此否认它可能带来的副作用。

第二,对外开放提供了向市场经济转轨所需的制度性知识外溢。

对于长期生活在封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各类行为主体而言,其既有知识基本适用于计划经济。在缺乏另一种社会经济生活实践的情况下,知识的真空使之不能也不敢贸然尝试新的生活方式。此时,遥远国度的另一种社会经济生活方式尽管有一定启示意义,但是相对有限,因为你不知道它移植到本土是否可行。可是,外商投资企业则不同,它就在身边运行着,其中工作的员工就是过去与你一样的人。它的运行方式、投入、产出、业绩,清清楚楚地发生在周围,可以比较、学习和仿效。对外开放所产生的近在咫尺的制度性知识外溢效应,提供了转轨经济体内普通群众就近学习、干中学和及时检验学习效果的机会,大大降低了体制转轨的学习成本,减少了学习时间,提高了学习效率。

相形之下,封闭条件下的自主改革,或因缺乏学习对象而不得不暗中摸索,增加探索成本;或必须劳师远征学习,获得学习机会的人数非常有限,最需要学习的改革参与者——老百姓一般难以获得学习机会。因此,整个经济体的学习成本高昂,效率很低,体制转轨迫切需要的知识更新因此需要更多时间,从而延缓改革进程。

第三,对外开放提供了强大而持久的外部竞争强制,迫使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化。

并不是所有人都愿意主动接受对外开放所产生的制度知识外溢,不仅旧体制下的既得利益者将拒绝,而且部分群众也首鼠两端,他们既期盼市场化带来的收益,又不愿冒过大的政治经济风险,也不

改革并非没有收益,但是,体制内的改革者在首倡或发起改革之时,所要克服的阻力,可能的风险要远远大于个人的期望收益。

John H. Dunning and Rajneesh Narla e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Government: Catalysts for economic restructuring*, London, Routledge, 1996.

愿放弃旧体制下的清闲、安逸和稳定。外部市场力量对不愿抛弃旧体制下生活方式的群体将产生强大而持久的外部竞争强制,逼迫旧体制产生适应性变化,迫使其逐渐转入新体制轨道。其根本原因在于市场经济是优胜劣汰的竞争经济,它比计划经济有着更高的效率。一旦从外部引入市场经济,它就必然逼迫旧体制做出选择:或者将它驱逐出去,重新闭关锁国;或者接受它的竞争强制,向效率更高的市场经济运行方式转轨。

显然,在封闭而非对外开放的条件下,体制内自主改革极易因旧制度的既得利益者的阻扰而流产或无疾而终。然而,在对外开放下,来自外部竞争所造成的生存危机为体制内的彻底改革提供了最强有力的支持。

第四,对外开放为改革提供了巨大的市场化转轨收益,为开放地区更快地向市场经济转轨提供了资源支持。

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必然涉及不同社会阶层、不同地区之间的利益再分配,由于在原分配格局中获得较大份额的既得利益集团对决策有较大的影响力,因此,一个纯利益再分配的零和博弈,成功的几率几乎为零。不论其利得合理与否,过早触动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对改革显然不利。因此,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采取了增量改革,老人老规矩,新人新办法,双轨制等过渡措施,降低阻力是最重要策略考虑之一。对外开放对改革的重要贡献之一在于通过引入外来市场力量,形成新增长点,提供收入增量,实现正和博弈,有效地降低改革阻力,促进开放地区更快地向市场经济转轨:

1. 对外开放在体制外提供了市场化运行的新空间、新载体,提供了新体制运行所需的启动资源。在保持原有体制的运行机制、管理方式和利益分配格局基本不动的情况下,改革者通过引进外资,用符合国际惯例的方式运行,为勇于下海者创造机会,使之获得更多收入,引导更多社会成员走向市场。这种双轨制运行方式在改革初期极大地降低了改革的阻力,同时为广大缺乏市场经济知识的群众提供了就近学习的机会。

2. 对外开放引进外资,更充分地利用当地闲置的土地、劳动力等资源,优化开放地区的资源配置状况,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使转轨通过开放成为更大的正和博弈,使开放地区的市场化过程有可能成为一个持续的帕累托改进。

3. 对外开放提高了开放地区的经济增长率,增加了当地居民收入和财政收入。这既有利于政府投入足够资源推进市场化改革,又有利于让更多社会成员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提高民众对市场化改革的支持度,提高社会对改革开放的支持度。

反之,若没有外来资源支持,改革的困难和阻力就大得多。1979年农村承包责任制改革大体属于此类,困难如此之大,首倡其事的安徽小岗村农民居然要冒着坐牢的风险进行改革;推广如此之难,即使联产承包制在安徽、四川已获得巨大成功,有些省份仍置之不理。开放使改革获得了巨大支持。这可以说是30年改革进程中东部沿海开放地区的市场化进程,远远高于西部内陆地区的重要原因之一。

因此,本文的结论是:对外开放是推进中国经济市场化改革的根本手段之一,改革必须与开放携手。从开放走向市场,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实践值得重视的基本经验之一。